■ 红色记忆·不忘初心

傅健行、袁清华两人打入国民党军第二十集团军书记室后，工作英勇机智，搞到许多情报，其中有不少是重要军事情报，为我军掌握敌情、进行军事斗争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插进“敌人心脏”的红色特工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
1942年，济南正处在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之下，遍地血腥，满目疮痍。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，按照我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、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、以待时机的政策，我地下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，顽强机智，埋头苦干，前赴后继地与敌人作不懈斗争。今年95岁高龄的王中午老人，当年便是潜伏在济南的中共红色特工。7月底，老人在济南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。虽然老人身体有些虚弱，但说起老战友和地下工作的往事，仍旧条理清晰：“参加地下党对敌斗争时，我曾用向真作为党内代名。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，意思是向往真理。”

1951年5月6日，中共济南市委组织部追悼赵正阳、王馨华等烈士大会留影

遇到改变一生轨迹的人

1923年腊月，王中午出生在济南一个城市贫民家庭。19岁高中辍学后，到济南黑虎泉小学当了一名教师，肩负起家庭的重担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轨迹的人。

那是1942年秋，时任中共宁阳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治委员的赵正阳，奉命到济南开展地下工作。时年24岁的赵正阳，原名景惠，字汉广，化名寒光，济南十六里河人，历城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，参加平津学生抗战救国团。1937年10月，到聊城范筑先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1938年，参加了范县的抗日游击队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调任汶上县动委会主任，1939年7月兼任汶东工委宣传部长。1942年春，入冀鲁豫区党委干部轮训班学习，结业后被派往济南。

初到济南，赵正阳一时找不到工作，几经周折，终于通过曾在历城县立师范任教员的俞吉仁介绍，去市郊王庄小学担任教员。后来为了工作方便，又调到济南市内黑虎泉小学任教员，并在南凤凰街租赁了一间小屋，这才有了合法身份和安身之处，开始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。

犹如一粒种子，赵正阳在新的土壤里深深地扎下根来，成长、发芽、壮大、结果。那时他在校担任历史、地理课老师，经常巧妙地利用课堂教学机会，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，借以激发学生的爱国心、民族恨，唤起他们抗日斗争的精神。他又利用课余时间走访家长，从中发现积极分子。经校方同意，赵正阳组织成立了黑虎泉小学家长联谊会，并推选家长刘殿元为会长，把校外群众组织了起来。学生冬季教室取暖问题，通过家长联谊会解决了；该校地下党员王馨华老师一度被日寇的泺源公馆逮捕，赵正阳也利用家长联谊会的名义，将王馨华老师联名保释了出来。家长联谊会的威信越来越高。

“赵正阳同志工作踏实深入，有魄力，充满革命热情。他白天忙于教学工作，晚上进行活动，搜集情报，分析情况，每天忙到很晚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。他不顾身体有病，对别人却关怀备至。他紧密团结校内外群众，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，开展地下工作。”王中午介绍，在四年的地下工作中，赵正阳亲自发展了他与王馨华、胡福海、王希圣四人为中共党员，为地下党的工作开展打下了基础。

1945年5月，由于一个亲戚被捕叛变，连累了赵正阳，他被日寇特务机关泺源公馆逮捕。经过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和金钱美女的诱惑，赵正阳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，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坚强意志，未暴露党的任何机密。敌人无计可施，便将他羁押于残害中国人民的集中营——新华院。在那里，他受尽了迫害和虐待，做苦工、被毒打、被抽血、被狼狗撕咬……两个多月的折磨，使他一目失明，一臂失灵，但仍团结难友，坚持与敌人斗争。党组织多方进行营救未果，1945年8月28日，赵正阳惨死于新华院中，终年27岁。与他同时遇难的，还有他亲自发展的中共党员王希圣。两人牺牲后，被日寇埋在无影山下的万人坑中。

日寇投降后，一位姓张的难友从新华院出来，找到住在三合街赵正阳的亲戚贾文坤说：“赵正阳让我给你捎个信，说他不行了！很想念家里的人，要家里人把生意做好。”在临终之前，赵正阳仍不忘革命，暗示同志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地下工作立稳脚跟

1942年被组织派往济南的，还有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雷紫屏。雷紫屏1937年初冬参加革命，1938年10月辗转抵达延安，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、马列学院敌后城市工作干部训练班学习。

来济南之前，雷紫屏先到禹城县找到一个在伪县府当秘书的老朋友，搞到一张良民证，并打听到自己爱人杨景羽在济南的下落。到济南后，雷紫屏找到了在成通纱厂职工子弟小学当教员的杨景羽。听说爱人住在南门外棋盘街一个小杂院内，院内还住着一个伪派出所的巡警，他决定暂不回家，在女工宿舍临时借了一小间房子住了下来，对外人则说：在外边经商失利，回家来看看。

草草安顿下来后，雷紫屏便天天早出晚归，访熟人，托关系，四处奔波，想找一个合适的职业作掩护。有一次杨景羽见他礼帽上沾有污水，问他，才知道他在纱厂东边铁道洞子挨了打，帽子被鬼子扔到了路边水沟里。杨景羽感到很气愤，他反而安慰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会慢慢适应的。”环境艰苦，但他的情绪从未显出半点消沉。

经过多方努力，雷紫屏终于在老同学的引荐下，打入伪山东行政人员训练所，当了一名训练员。这个伪行政人员训练所，是专门给县政府培训科级以下行政人员的，它的最高长官是日本顾问，实权却交给了一个叫曹若山的教育长。曹若山是个相当顽固的汉奸，但学员大部分是混饭吃的小知识分子，多数还没有丧失民族意识，不甘心当汉奸。经过认真分析，雷紫屏决定首先在中层人员中联络关系，以求站稳脚跟，并在学员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。他通过讲课和个别接触，多方面启发学员的民族自尊心。通过各种活动，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。又从积极分子里，经过耐心教育培养，发展了崔云超、许宝笃、傅健行、袁清华参加党组织。依靠进步力量，雷紫屏组织了打击汉奸教育长曹若山的斗争，迫使曹若山灰溜溜地离开了训练所，在这个伪机关中站稳了脚跟。

隐蔽战线中的斗争艺术

1944年初，冀鲁豫边区党委组织部派张洁泉任济南地下党政治交通员。“一般地下交通员，只有传送上下级讯息的任务，而政治交通员则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地下工作情况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决定问题，对于重大问题请示边区党委决定。”王中午介绍。

张洁泉化装成商人模样，通过关系办理了身份证进入济南市区，分别找到雷紫屏和赵正阳，了解地下斗争情况，并部署了工作。1945年8月，张洁泉又一次来济南，传达了抗日胜利大好形势。根据当前情况布置了任务，并召集了有关同志宣布了党委的决定：济南地下党一支部，由雷紫屏任支部书记，许宝笃、崔云超任支委；济南地下党二支部，由王馨华同志任书记，胡福海、王中午任支委。两个地下党支部宣布正式成立。

为了加强济南地下党和外面党委的联系，张洁泉先后培养了王成金、李乐春、李心灵和庞盛华四人为地下交通员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携带密信、情报，出入敌人关卡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王中午介绍，我党我军历来重视第二战线的工作，它与第一战线互相配合，并为第一战线服务。因此在敌占区隐蔽战线中要注意斗争艺术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，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。同时，在地下斗争工作中，党员要严守党的机密，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党组织的机密，包括对自己的亲友和爱人。实行单线领导，不准发生横的关系。支委之间互相不谈下属组织情况，支委会除重大问题不集体讨论，多是由支书找支委单独研究情况，布置工作，强调善于独立工作，遇到问题及时请示，不需要知道的事不要去问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，因此避免了敌人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。

济南地下党支部，根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，通过广泛团结教育群众，在群众运动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，确保党员质量。济南两个地下党支部，先后有4名党员被捕，壮烈牺牲，他们都保持着崇高的革命精神，严守住党的机密。“地下党组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，不断发展壮大，截至济南解放前夕，济南地下党两个支部共计36人，其中一支部23人，二支部13人。”王中午介绍。

打入敌军首脑机关

1945年9月初，日寇投降后不久，雷紫屏接到冀鲁豫边区泰运地委城市工作部(后改为鲁西工委)的指示，说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，调10万军队，进攻山东解放区，我们必须迅速组织力量，搜集情报，掌握敌情，以供我军领导机关研究对敌斗争的需要。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，党支部经研究讨论，决定把打入敌军首脑机关的任务交给傅健行。

傅健行是陕西省沔县人，青年时期参加过东北抗日队伍，英勇作战，屡建战功。1941年冬和部队失散后，到济南投亲靠友，在我地下党的教育下，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，于1945年入党。当负责与傅健行单线联系的崔云超把支部这一重要决定通知他时，傅健行十分高兴，立即表示：“一定要排除万难，打入敌军，做出成绩，为保卫解放区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。”

接受党的任务后，为了寻找打入国民党军高级军事指挥部门的机会，傅健行奔波了半个多月，终于在一个熟人处得知，他以前在东北军结识的一个叫唐本吉的人，最近刚从外地调来济南，在国民党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工作。这个总司令部统率新调来山东的第八军、九十六军、整编七十三师、第二军四支部队，是国民党军驻山东的最高指挥机关。傅健行非常兴奋，立即找到了唐本吉，通过了解，知道他在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书记室书记官，上尉军衔。几经周折，唐本吉介绍傅健行在书记室担任准尉司书。为了工作需要，组织决定再派党员袁清华打入，协助工作。通过唐本吉的介绍，袁清华到书记室当上了上士文书。

书记室是二十集团军的机要部门，掌管机密材料的收发。傅健行、袁清华打入书记室后，工作英勇机智，搞到了许多情报，其中有不少是重要军事情报，如全国各部队番号、代号表，空降地面联络布板信号，所属部队调防命令等，为我军掌握敌情、进行军事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如1946年在华东地区一次战役中，某城刚被我军攻下，正巧飞来国民党军的三架运输机。当时我军在城内一个广场上，按照傅健行搞来的空降地面联络布板信号的规定，他们摆下红白两色布板，三架运输机当即投下了大批军用物资。为此傅健行同志被工委记大功一次。傅健行曾兴奋地说：“工委给我记功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，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。让我高兴的是，蒋介石又一次听了我们的指挥！”

此后，他们搞到的重要军事机密越来越多，如二十集团军所属各军、师、团的人员、军械、弹药、装备定期统计报表，全国军用电报密码、全国防御工事构筑标准设计图册、济南市城防腹案等。这些军事情报对我军战斗起了很大作用，工委向傅健行宣布第二次记大功的决定。

这时，傅健行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意。据党支部分析，一是总司令部不断收到下属组织报告，说时有不明番号的部队，夜间按照国民党军规定的口令，通过封锁线；也时有国民党军调防时，中途遇到八路军的伏击，伤亡惨重；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时，捡到我军丢失的一份胶济线国民党军配置实力图，虽非原件，但内容要点相同。敌军司令部十分紧张，一片慌乱，立即进行追查。

党支部决定，为了同志安全，要傅健行立即撤出二十集团军司令部，迅速转移。但就在这时，傅健行得到一个重要消息，总司令部刚刚开过一次高级军官会议，根据蒋介石的指令，决定调动大量兵力，打通胶济铁路，接通海运补给线。但是详细计划不清楚，估计近几天总司令部就会由参谋处发布命令。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，经组织同意，傅健行决定将这份情报搞到手后再撤出“敌巢”。

国民党军总司令部终于向下属各军发出打通胶济线的命令，傅健行当天就把这一重要情报抄件送给了崔云超，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。可就在第二天，傅健行同志不幸突然被捕了。

傅健行被关押在司令部卫队里，特务头目亲自审问，咬定傅健行把复写纸上面加盖的一份搞出去了，但找不出任何证据，于是反复刑逼利诱。特务头目说：“交出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名单，可以让你升官发财，否则就枪毙，由你自己选择。”傅健行质问他们：“你说我搞出去了，我是怎样搞出去的？搞到哪里去了？证据何在？”问得特务瞠目结舌，无法回答。

傅健行坚强不屈，痛斥敌人暴行，严守党的机密，捍卫党组织的安全。最后，敌人为掩人耳目，玩弄了一个交军事法庭审判的花招，并指使别人出庭诬证，判处傅健行死刑。

1946年8月2日，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，抱着宁死不屈的坚强信念，傅健行于周村火车站下从容就义。崔云超不顾个人安危，赶赴刑场，混在群众之中，怀着悲痛的心情，诀别亲密的战友，收殓了傅健行的遗体，对其家属进行慰问，并作了妥善安置。

“健行同志深入敌穴，打入国民党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工作，像一把尖刀，插在敌人的心脏，他英勇机智，屡立战功，临危不惧，壮烈牺牲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贵的品质，济南人民永远铭记他为党为民的卓越功绩。”王中午表示。

英勇斗争迎接解放

1945年8月，赵正阳牺牲后，负责地下党二支部工作的是王中午的女战友王馨华。

王馨华化名若萍，东北人。她出身贫苦，靠亲友接济上学，毕业于辽宁女子师范，后随父来济南教书。她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热心公益，而且多才多艺，深受师生及家长的爱戴，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王中午老人近照 陈巨慧 摄

1948年9月10日晚，王中午接到通知，赶往王馨华住处。原来是上级派地下交通员李同志带来了上级指示：济南战役即将开始，要求迅速作好准备，紧密配合，迎接济南解放。“我军解放济南的战斗终于要到来了，我们无不欢欣鼓舞，几乎高兴得跳起来。随即研究在济南战斗打响前后如何当好我军的向导，争取敌军起义，护厂、护校、护档案，以及弄清国民党党、政、军主要头目名单住址等项工作，并作了周密布置和分工。”王中午回忆。

由于王馨华曾经两次被捕，均化险为夷，目标较大。一旦济南战役开始，恐怕敌人狗急跳墙，进行大屠杀，因此，上级党组织要她暂时转移出去。王馨华却坚定地说：“我走了对工作不利，解放济南正需要人，留下来有危险，但我会想办法隐蔽，请组织上放心。”王馨华不顾个人安危、一心为革命的精神，使同志们深受感动。王中午紧紧握着她的手，嘱咐她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保重自己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竟成了他和王馨华的永别。

经过八个昼夜的激烈战斗，我军歼灭了大量敌军，从城东南和西南角突破了内城，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济南城头。当同志们怀着胜利喜悦的心情，赶到王馨华住处时，却看到她胸部中弹，倒卧在东屋窗下的血泊中。大家惊呆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万分悲痛。从王馨华母亲口中得知，原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，国民党杂牌军保安第六旅徐振中部一个团，从郊区向城内退缩，有一个副团长住在王馨华院内，王馨华趁机对他进行争取工作，那个副团长已表示愿意起义反正，却不料被派在该团的一个国民党特务探知，下了毒手。“馨华同志惨遭杀害，时年37岁，她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在黎明前，在济南解放的前夕离开了我们，同志们含着眼泪把她掩埋在七家村附近一块空地上。1952年，遗骨被移往英雄山烈士公墓。”

1948年9月19日，济南战役打响后，当时在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会计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陈特昌，为了保护财会档案不被敌人破坏，进行了严密的监视。国民政府曾想利用飞机将省府档案全部空运青岛，由于敌机场迅速被我军占领，未能得逞，于是将财会档案放在两个大缸内，秘密埋在省府院内。济南解放后，陈特昌立即引导我军管会财粮部的同志挖出了全部财会档案，并将原会计处工作人员找回，为我军管会顺利接收财经工作，起到重要作用。

齐鲁大学是教会办的最高学府，在国内外享有盛名，政治上却很复杂，也是高级人才集中的地方。如何做好接收工作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我所用，特别是了解内部情况，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，这一重任就落在齐鲁大学唯一的地下党员任中身上。他积极向军管会、公安局等单位提供齐鲁大学人员政治情况，为协助军管会等部门顺利接收及人员的任用，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身份为国民党73师某连政治指导员的苏宏因，当时正退守在城内县西巷一带民房中，在我军猛烈的炮火进攻下，苏宏因巧妙地对敌军进行瓦解工作，驻守的官兵不少放下武器，纷纷开了小差，动摇了敌军士气。济南战役结束后，苏宏因积极协助我军管会、公安部门，逮捕该师化装潜伏在济南的高级军官多人。他们均对迎接济南解放作出了贡献。

济南解放后，王中午曾任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干事、文教部学校教育科副科长、济南二中校长、济南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、济南师范党总支书记。

·相关链接·

根据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”的指示精神，地下党工作重点放在青年学生、教师、文化界等方面。支部根据知识分子特点，采取以文会友、读书会等形式团结教育知识分子。

隐秘争夺济南文学艺术阵地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政府接收济南，宣布要对济南市中小学广大教职员实行“甄审”，想借机剔除一大批教职员，安插他们的亲信。当时受到失业威胁的教职人员悲苦无告。

针对这一情况，雷紫屏与党支部研究决定：以我党的名义，写一封给济南中小学教师的公开信，说明八年抗战中教师们身陷敌区的悲苦状况，和他们盼望胜利的爱国热忱；现在抗战胜利了，却面临着失业的威胁，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教职员非常同情，热烈欢迎他们到解放区工作。信写好后，交党员刘昭富、许宝笃、庄守育连夜印好，装入由内线关系搞来的印有“山东省政府”红字下款的大信封，标上“特急”字样，通过邮寄或投送到各个学校去。

这封信发出后，在广大中小学教师中震动很大，反应强烈。大家奔走相告，有的教师说：“还是共产党体贴咱们这些穷教员。”也有人悄悄打听，哪里有共产党的接待站。这次特殊的政治攻势，虽没有完全阻止反动教育当局的“甄审”活动，但国民政府大员的嚣张气焰却有所收敛。

根据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”的指示精神，地下党工作重点放在青年学生、教师、文化界等方面，以便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我党我军及政府工作。支部根据知识分子特点，采取以文会友、读书会等形式团结教育知识分子。当时由北平回济的有一批大学生，地下党员姜千里、陈特昌通过同学关系组织成立同学会，通过学习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进步文艺书籍，启发他们对时局的分析，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，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。通过学习，陈耕野被吸收入党，周永顺、陈鼎奔赴解放区工作。

张子华在铁路局工作时，组织了一个文艺写作会，团结了爱好文学的职员7人，并出了一本名叫《警钟》的刊物，一共出了四期。起初约定每人一至两周写一篇文稿，然后装订轮阅，当时只限会员中传看，后又逐渐扩大，至第三期改为油印装订本，大家踊跃投稿，广为传阅。虽办至第四期因故停刊，但在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后来张子华等3人又发起成立读书研究会，每月凑款购买《新闻天地》《观察》《文萃》《太平洋》《民主》等杂志，其中不乏揭露时弊的进步文章。

地下党还积极利用敌人的宣传阵地为我所用。《大华日报》当时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办的报纸，雷紫屏通过同学关系当上了该报的记者，他利用记者的身份，采访部队、机关、工厂、学校、群众，收集资料，写了许多新闻报道，揭露物价飞涨、货币贬值、民不聊生、怨声载道的“黑暗”现实，反映了人民群众反饥饿、反内战的强烈呼声，揭露了国民党党政要员的“腐败”。还从一些“剿共”将领的败迹中透露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，起到了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动面目、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。

争夺济南文学艺术阵地，团结广大进步青年知识分子，实现我党在济南文艺战线上的领导。

徐北文时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员，是我党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可靠骨干力量。他曾要求到解放区工作，经地下党支部研究，认为他思想进步，擅长文艺，可利用合法职务留在济南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徐北文同意留在济南，并根据党布置的任务，积极开展文艺界的工作。

1947年底，借职务之便，徐北文以教育馆指导民众文艺活动的名义，提请本馆批准成立济南剧艺研究社，并请该馆馆长王玉符、正气剧团团长王侣为社长。徐北文联合该艺术部的秦灏、邹煜泰，正气剧团的叶涛、郜大琪及王炼等为发起会员，并拟定了一份履行手续所需要的章程，呈报国民党政府济南市政府社会局备案。社址则设于教育馆艺术部，这就使该社在国统区取得了合法地位。但这只是一种公开的形式，实际是两位社长均为名义社长，并不具体任事，开展活动也并不都在民众教育馆内。真正的负责人是徐北文、王炼和叶涛三人，活动内容由三人商讨决定。

参加剧艺社的前后有三四十人，采用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，多是小范围的接触或聚会。小型集会，地点除在教育馆艺术部外，多选择商埠公园（现中山公园）、大明湖或趵突泉的茶馆。三五人时，则在成员的家中见面，有的是共同阅读革命著作，有的只读进步的文艺理论，因为这些青年有的是倾向革命的，有的则只是爱好文艺和戏剧。

他们还利用当时公开出版的报纸副刊，有组织地发表暴露社会黑暗、向往革命的文学创作，进行宣传教育。如徐北文在诚报主编《影剧谈》周刊，叶涛在《山东新报》主编《影剧》周刊，并以济南剧艺社的名义在《山东新报》编辑《文艺周刊》，后更名为《星期文艺》，在《大华日报》（国民党主办的报纸）编辑《戏剧·文学》周刊。这四家报纸的副刊，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的宣传阵地。此外，还曾以艺术部干事合法职务，以教育馆的名义，举办青年学生美术展览会、青年文艺讲习班，并为学生会演出了《夜店》《十字街头》《升官图》等进步剧本。

通过这些活动，济南剧艺社团结教育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，向解放区输送了人才，有的入了党，成为文艺工作的骨干力量。